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

刘建江, 禹 璐, 李喜梅, 易香园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长期巨额贸易逆差调整广受关注, 此问题涉及到调整目标和调整成效的讨论。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把控国际贸易秩序的话语权; 二是推进再工业化, 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三是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充分的就业与低通胀; 四是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地位。金融危机后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及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幅度缩小, 目标逐步趋近, 预计以美国贸易逆差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的调整目标将在一定区间内继续波动, 但较 21 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收窄。而 COVID-19 疫情的冲击将使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开始偏向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贸易逆差; 调整目标区间; COVID-19 疫情

[中图分类号]F7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2-0037-15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2.006

Studying the Target Rang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Adjustment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LIU Jian-jiang, YU Lu, LI Xi-mei, YI Xiang-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adjustment of the long-term large trade deficit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adjustment targets and the adjustment effects. The objectives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adjustment mainly include four aspects: firstly, controlling its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secondly, promoting re-industrialization to seize the commanding height in the new rou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rdly, maintaining relatively st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employment and low inflation; fourthly, continuing to maintain dollar hegemon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US trade policy have narrowed the US merchandise trade deficit with targets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adjustment target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GDP expectedly continues to fluctuate within a certain range, but it is narrower than the range in recent 20 year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brunt of COVID-19 will shift the adjustment target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towards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trade deficit; area of target adjustment; COVID-19 epidemic

收稿日期: 2021-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课题攻关项目(17JZD022)

作者简介: 刘建江(1971—), 男, 湖南隆回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禹 璐(1991—), 女, 湖南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金融学;

李喜梅(1963—), 男, 湖南涟源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研究;

易香园(1996—), 女, 湖北公安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成为经济常态。2008 年金融危机后,巨额贸易逆差被认为是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实力、威胁其世界绝对领导地位、削弱美国霸权的重要因素。此后,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试图调整进口型增长模式,于 2010 年提出“出口倍增计划”,明确指出要“缩减贸易赤字、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继承了前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并提出削减巨额贸易逆差以恢复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增加国内就业岗位并恢复经济增长,进而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核心政治目标。对于刚上任的拜登政府来说,贸易逆差也是其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在全球化、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意味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将影响国际资本流量与流向,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需要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在长期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贸易逆差常态化趋势,非短期内所能逆转,故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在其目标函数中可能存在一个基本的目标区间,在这一目标区间内,能基本保持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低失业率,能维系美元霸权和保持美国足够的竞争力。本文旨在探寻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区间,并且提出依据不同的贸易逆差调整目标区间来判断调整成功与否的思路。

二、文献回顾

(一)贸易逆差是否需要调整

学者们通常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来讨论其调整目标,大致可归为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巨额贸易逆差可持续,不会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或者说逆差不存在问题,无需调整。

以 Dooley, Folkerts-Landau, Peter 为代表

的学者构建了一个通用的 DFG 模型,将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BWID)描述为“中心国—外围国”体系,美国是“中心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大量输出美元资产^[1-2]。亚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属于“外围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通过从美国获得贸易顺差来进行外部融资,增强市场稳定性预期,使本币汇率保持相对低估状态,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把所获得的外汇重新投入到“中心国”,支撑美元霸权地位,为美国的经常赤字融资。只要“外围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其剩余劳动力达到边际产出大于零时,BWID 将继续稳态运行,美国经常性失衡就可持续。

学者们在 DFG 模型的框架下来分析 BWID 体系,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资金缺口,能由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弥补,共同形成庞大的美元“发行—回流”机制,维持了美国经济增长并能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从而使得美国贸易逆差长期化^[3-5]。在美元体系下,顺差国被动地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以免美元贬值导致顺差国自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一方面,美国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又投资于这些国家来赚取资本收益,并且获取财富转移效应的巨大红利,弥补赤字^[6];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超额发行美元来稀释外债,减轻财务负担^[7]。也有学者用“金融—制造”国际分工体系来描述美国贸易逆差现象,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8]。

另一种类似的分析逻辑是从金融市场与全球资产组合角度来描述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在全球储蓄长期过剩背景下,美国有全球最发达且容量巨大的资本市场,通过货币、汇率和金融政策主导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也是全球较为理想的投资地,各贸易顺差国倾向于投资美国的美元资产,美国因此获得全球性融资并可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赤字^[9-10]。Gourinchas & Rey 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头寸(NIIP)/GDP 是否处于稳态或收敛于某一个稳定水平,

外国资本是否有流入的意愿来考察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11]。外国在美国的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美国在国外的资产收益率,所以,虽然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但净投资收益为正,依靠对外投资的收益平滑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有效调节外部失衡^[12]。

有学者干脆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并非美国的软肋。长期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贸易逆差的存在是美国经济强大的体现^[13-14]。经过测算,持续的贸易逆差并未影响美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主导产业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产品价值链的高增值部分仍旧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15]。全球价值链和行业内贸易在快速发展,但贸易统计数据未能充分体现通过中间产品跨国贸易而不断扩大的商品、服务贸易,因此,美国的实际贸易逆差要小于名义逆差^[16]。全球经济失衡是市场自动选择的结果,本身具有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持续性,无需政府干预^[17]。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是其实现本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能更好地协调美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18]。

第二派认为,巨额贸易逆差不可持续,需要调整,要考虑调整成本和调整目标。

Goldstein & Lardy 认为,在 BWII 系统当中,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承担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巨额融资压力,大量储备美元会使外围国家面临支付和储备缩水的风险,增加了亚洲央行的对冲成本和通胀压力,弱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19]。同时,世界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and 激烈的竞争又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复杂化,汇率频繁波动,并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将难以持续。美国连续不断的巨额贸易逆差直接结果是其净外债的不断累积,随着净外债不断积累,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呈现边际递减态势^[20]。

Mussa 亦用 NIIP/GDP 指标来分析经常项目失衡的可持续性,认为 NIIP/GDP 终将达到

某一临界点,国外投资者将不再愿意增持美国资产,美元价值面临崩溃危机,全球性金融动荡也将在所难免^[21]。姚枝仲等认为,美国的 NIIP/GDP 不稳定,而资本流入意愿不高,故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22]。NIIP/GDP 不断上升,境外投资人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终将超过美国资本市场所能提供的回报率,流入美国的资金将减缓或停止,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减持美元资产风潮,美元汇率将可能大幅贬值。

有学者认为,美元是维持美国贸易逆差可持续的基础性因素,美国的净外债与 GDP 之比控制在 50% 以内方能避免美元危机^[23]。相比其他调整渠道,美国对外负债的汇率调整更具有可操作性,O'Neill & Hatzious 通过 NIIP/GDP 的测算表明,若要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下降到 GDP 的 2%,汇率贬值幅度将高达 43%^[24]。为弥补日益增大的“双赤字”,美元加权汇率贬值 10%—20% 的条件下,NIIP/GDP 将有可能在 20%—30% 之间达到稳态,否则不断攀升的 NIIP/GDP 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安全隐患^[25]。

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是推迟调整,越难以实现平稳调整,最终的调整成本也会越高^[26]。虽然美元霸权短期内维持了美国经常项目的可持续性,但长期内必将面临崩溃风险^[27],庞大的债务降低了各国对美国的信任,美国通过过度发行美元攫取世界财富的行径也使各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有所不满。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全球失衡紧密相关。美国逆差与其他国家的顺差并存状态,属于“金融恐怖平衡”,其不断演化的结果是全球性不平衡状态必定会崩溃^[28]。在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并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传递把这种影响与冲击无限地放大,加大全球失衡^[29]。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调整到什么程度,其实不少学者心中并没有

明确目标。美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取决于境外投资人是否继续增加美元资产配置比重,当境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乐观需求预期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逆转从而出现调整,这种调整将达到 GDP 的 4%—5%^[30]。

(二)调整的责任方

基于不同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可得出不同的调整责任方,研究者不同的偏向会得出有差异性的结论。持储蓄—投资缺口论的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储蓄不足和贸易赤字存在着因果关系,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源于全球储蓄过剩,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储蓄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调整责任^[31-32]。在前总统特朗普看来,要调整美国贸易逆差,必须深挖贸易逆差源头,这一源头多为亚洲国家,即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需要从顺差国着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美国储蓄率低、边际消费倾向过高等内部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要从内部入手,美国要逐步改变赤字政策并提高储蓄率^[33-35]。

一些学者强调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双向性。在 DFG 分析框架下的结论是调整美国贸易逆差应该从美国的低储蓄、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入手,即调整对象应该呈双向性,新兴经济体和美国都要做出渐进式的调整。美国需要提高储蓄并且去杠杆,中国则需要提高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和灵活汇率制度,通过 FDI 而非购买国债重新分配东西方储蓄^[36]。Eichengreen 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思路,认为中国需要提高工资水平和推动人民币升值,由此可提高中国消费水平、改变居民储蓄习惯和消费方式^[37]。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需要世界各国的协调。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经济的长期性失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汇率升值不会改变其高储蓄的发展模式,贸易投资的双顺差格局也非短期内所能缓解^[38]。

还有一些学者依照汇率理论来分析调整的责任方,汇率也是分析贸易逆差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通过操纵汇率实现贸易盈余,因此顺差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历史上,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均曾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以此手段要求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降低顺差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和顺差,要求放松外汇管制,直至对美国的威胁下降才能移除“汇率操纵国”名单。美国财政部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美国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对中国施压的筹码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贸易逆差调整与汇率无关,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改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39]。

Obstfeld & Rogoff 从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讨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调整方向,认为需要调整美国可贸易产品的需求来解决美国长期且日益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问题。他们指出,美元应对世界主要货币主动贬值 30%—35%,由此规避投资者信心丧失所导致的被动调整^[40]。美国这种金融压倒实业的做法使得美国的创新力和生产力逐渐萎缩,只有通过协调美国国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调节贸易失衡问题,一味盯住汇率(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不放,只会加剧美国经济对外债持续的依赖^[41]。

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今美国政府真正关心的是国内经济,能够让全世界共同分担的巨额贸易逆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美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三)分析性评述

学者们对调整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性与调整途径有不同的观点,学者们基本上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短期内可以维持,但从长期来看,调整则不可避免。主要结论有两个偏重:以伯南克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储蓄过剩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以麦金农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在美国经常赤字的调整过程中,美国应该承担主

要责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低失业率并存,这也显示出至少短期内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至于巨额贸易逆差无所谓的观点,当前还难以有较好的理论来支撑。当然,学者们大多认识到各国相互协调,使全球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的重要性。但是至今难以出台一个完整的方案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而研究者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金融危机后,贸易逆差的调整上升到了战略高度,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之后,其经济政策倾向于经济内向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对单个贸易逆差来源地的调整要求也上升到了遏制性高度,但却忽视自身及他国的成本。

三、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战略目标

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高就业水平以及基本稳定的物价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由此出发,在考察美国贸易逆差与宏观经济体系变动的关系基础上,来分析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战略目标。

1971 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但由于 20 世纪整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美国贸易逆差的整体规模占 GDP 的比重较小,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1980—2019 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波动中持续增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有所下降,服务贸易一直保持较稳定的增长趋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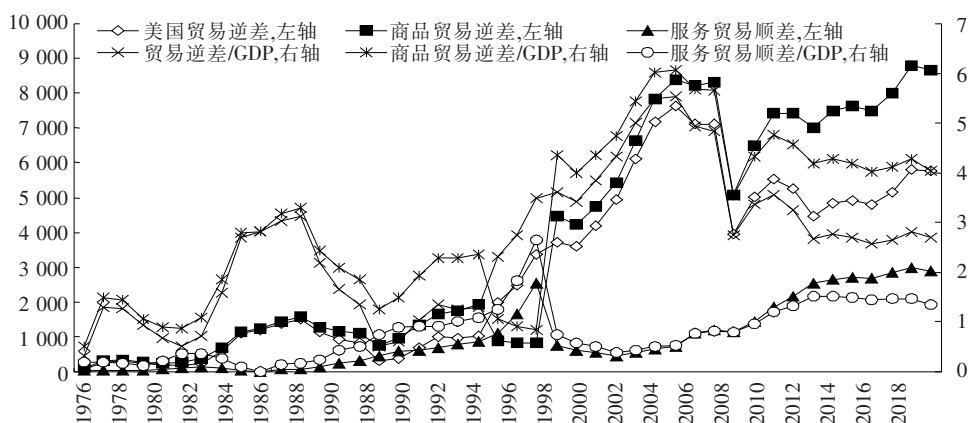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 1976—2019 年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贸易逆差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更新时间:2020 年 7 月 2 日

1982—1987 年,美国贸易逆差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由 1982 年的 241.56 亿美元增长到 1987 年的 1 516.84 亿美元,增长了 5.27 倍,1987 年贸易逆差占 GDP 的比重为 3.12%,超过 3% 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至此,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演变成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贸易逆差的调整也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并由此出现了以“广场协议”为标志的世界范围内的调整举措。

1987—1992 年,美国贸易逆差进入了调整

期并且逐步缩小,1991 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 311.36 亿美元,为 1982 年以后的最低值。但 1993 年后又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时期,商品贸易逆差由 1993 年的 1 324.51 亿美元扩大至 2007 年的 7 110 亿美元,增长了 437%;而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趋缓,1993—2007 年仅增长了 77%。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 1993 年的 848.06 亿美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7 592.4 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 795%。到 2006 年底,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的比重超过 6.4%。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国民经济一度陷入困

境,为应对经济衰退,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即决心缩减贸易逆差,大力鼓励出口,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并提出制造业重振战略,即当前的再工业化战略。

金融危机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占 GDP 的比重出现见底反弹上升态势,到 2012 年仍有 4.77%,联邦赤字占 GDP 比重为 6.7%。显然,该时期美国贸易差额和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均超过 3% 的国际警戒线。2009—2013 年上半年,美元基本上处于贬值趋势,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美国贸易逆差保持平衡。2013 年下半年以来,美元重新步入强势通道,美元指数由 2013 年 5 月 29 日的 84.10 上涨至 2015 年 9 月 4 日的 96.22。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来看,2014 年较 2013 年增长了约 400 亿美元,但经常项目逆差却减少了 107 亿美元,若再看在此期间美国股市连创新高的局面,则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可持续的前景似乎显得乐观。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 2014 年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

界 100 年。前总统特朗普也是以“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美国梦作为竞选宣言的,与前总统奥巴马的美国梦一脉相承。拜登政府有意摒弃“美国优先”,取而代之的是“恢复美国领导力”。^①无论是在美国国内重建发展的力量源泉,还是在海外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实现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亦或恢复美国领导力,均意味着其必须继续推进美国经济增长、维护美元霸权地位。

第一,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充分的就业与低通胀。从 1980—2014 年美国 GDP 增长率、失业率与 CPI 指数变动情况来看,平均值分别为 2.637%、6.388% 和 3.492%。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世界经济进入滞胀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高失业率、高通胀与 GDP 低增长率并存。排除这一特殊时期,我们来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与上述三大指标的变动情况(如表 1 所示)。1989—1993 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下降,然而失业率、CPI 则基本上处于均值之上,而 GDP 增长率则在 1990—1991 年出现了明显下滑。

表 1 1990—2019 年美国 GDP、失业率与 CPI

年份	GDP 增长率	失业率	按 CPI 计 通胀率	年份	GDP 增长率	失业率	按 CPI 计 通胀率
1990	1.92	5.6	5.4	2005	3.35	5.08	3.39
1991	-0.07	6.83	4.23	2006	2.67	4.62	3.23
1992	3.56	7.5	3.03	2007	1.78	4.62	2.85
1993	2.75	6.92	2.95	2008	-0.29	5.78	3.84
1994	4.04	6.1	2.61	2009	-2.78	9.25	-0.36
1995	2.72	5.6	2.81	2010	2.53	9.63	1.64
1996	3.8	5.4	2.93	2011	1.6	8.95	3.16
1997	4.49	4.94	2.34	2012	2.22	8.07	2.07
1998	4.45	4.51	1.55	2013	1.68	7.38	1.46
1999	4.69	4.22	2.19	2014	2.57	6.17	1.62
2000	4.09	3.99	3.38	2015	2.86	5.28	0.12
2001	0.98	4.73	2.83	2016	1.49	4.87	1.26
2002	1.79	5.78	1.59	2017	2.27	4.36	2.13
2003	2.81	5.99	2.27	2018	2.86	3.93	2.44
2004	3.79	5.53	2.68	2019	2.33	3.68	1.81

数据来源: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mac/indicator_FP.CPI.TOTL.ZG.shtml

1994—2000年,在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并高企的同时,失业率、CPI在均值以下,而GDP增长率则在均值以上,并远高于均值水平,显示了巨额贸易逆差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胀并存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一时期,学者们较少讨论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问题。2001—2002年美国出现经济调整,2003—2006年则出现复苏,失业率与CPI基本处于均值以下,而在此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出现了新一轮增长,2006年高达7635亿美元。这一时期,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的讨论日益增多。

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09年开始,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较上年度大幅下降,但是失业率却处于高位,基本上接近20世纪80年代初的滞胀期,不过CPI指数还处于相对的低位。整体上,过去近三十年来的美国经验显示,有近1/3的时间实现了逆差与三大指标的良性互动。贸易逆差减少的时期,也基本上是失业率相对处于高位的时期。由此看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并非要使之趋向平衡,而是要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的充分就业与低通胀率情况下的适度贸易逆差。

第二,继续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大国与第一强国的优势,重新定义国际贸易话语权。美国贸易战略是其国家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宏观经济战略调整的一个部分,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二战以来,美国主导构建了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长期通过WTO来主导国际贸易秩序,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这种“收租人”的身份使美国以低成本获取了巨大的贸易收益^[42]。美国21世纪整体战略的核心便是要维持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43]。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地位进一步受到中国的挑战。中国外贸在入世以后迅速发展,2013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直至2016年美国才再次跃居全球首位。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正是享受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全球化

红利,并且冲击了美国经济安全,美国希望撇开WTO多边规则,重构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遏制中国崛起态势^[44]。

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贸易规则、国家贸易政策方面曾作出相应地调整,大力推进不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抗衡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影响力。^②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优先”战略的实施路线日益清晰,这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进一步延伸^[45],他在上任首日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10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威胁退出WTO。2018年9月,《美墨加协定》(USMCA)正式签署并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了形成对中国的遏制,构建“去中国化”的市场经济同盟,USMCA中引入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条款,即所谓的“毒丸条款”来构建新的经贸规则^[46-47]。上述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与以往政府大不相同的对外政策主张,可称之为一种美国式的“韬光养晦”^[48]。整体上,美国要重构国际贸易新秩序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将持续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并阻挡中国获得与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相称的话语权。

第三,再工业化战略顺利实施,为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制高点助力。科技创新优势是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根基,也是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进步通常来自制造业,新技术在全社会的应用和扩散也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设备和工具。先进制造业的培育与发展对其他部门有正向的外溢效应,在此背景下,前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即启动了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大力推动制造业的复苏、扩张与发展,谋求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前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不同的是,特朗普不仅希望美国

公司回流美国,更希望制造业的振兴可以带动更多的就业,明确提出两条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原则,即“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③

为推进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资本回流,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政策。前总统特朗普将最高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 35% 降至 15%,同时对本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 10% 的税收,以此推动资本回流。这至少在理论上将极大地减轻美国跨国公司的税务负担,实现其将流向海外的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目的,提升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为其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2017 年 12 月 22 日,特朗普政府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宣称将对于不支持美国经济发展的企业采取政治和法律手段进行惩罚,以此实现将流向海外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目的。特朗普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等相关措施振兴制造业,且恢复了管道基础设施计划,主张基建应使用美国制造的产品以此来刺激就业。同时,前总统特朗普对环境问题也有新的见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废除环境规则,取消奥巴马政府对能源行业的限制,而且捍卫煤炭行业,鼓励使用化石燃料,提出“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加快美国本土石油开发,有效降低制造业成本。

当前正处于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孕育时期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在中美贸易战中,精准打击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中国制造重点领域是美方的核心目标,延缓或阻挡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为美国制造抢占未来先机创造条件,从关键领域遏制中国持续崛起的态势。由此,也显示出美国对中国长期的战略制约,是要通过对中国部分重点行业的精准打击来延缓甚至阻挡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从战略上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

2018 年 4 月 27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 301 报告》,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国家”名单,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全面限制华为购买

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截至 2020 年 5 月,有 362 家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和机构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约占总数的 27%,管制领域主要涉及新兴技术、科研机构、国防军工等,^④表明美国实施贸易摩擦的首要目标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加速中美科技产业的脱钩。

第四,有效支撑美元霸权,尤其是美国霸权。美国霸权,是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的集合体,其物质基础就是美元霸权。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美国梦”,还是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质都是要维持美国霸权地位。其中,美元霸权是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美国不会接受任何挑战美元霸权的行为。

1944 年开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 BWI)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双挂钩”制度下的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自此,美国被称为“世界中央银行”。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双挂钩”机制被取消,美元的供给量摆脱黄金储备量的限制,开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开展弹性更大的信用扩张,彻底拥有自行“印刷”国际支付货币的特权,并成为其他货币的主要标价标准和锚定对象。美元特权使美国能通过“无泪赤字”获取“铸币税”,并且成功转嫁国内经济风险,直接促成美元回流,从而在其巨额贸易逆差下维持经济增长^[49]。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方面美元的霸主地位压制了外围国家发展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外围国家将其大部分经常账户顺差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资产使美元回流美国,间接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融资,美国随之演变为“全球头号债务大国”,大量地支取全球其他国家的储蓄以弥补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

当前这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赋予了美国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货币优势,为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将努力维持美元体系,即要想办法稳定“商品—美元”双循环体系。但 BWII 固有的“特里芬难题”又使得美

元霸权的基础不断弱化。因此,维持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最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历史上,一旦一个国家威胁到美国霸权或美元霸权,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反制措施,贸易逆差调整即成为重要的凭借^[50]。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挑起美日贸易摩擦,签订《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要求日本大幅度削减顺差。2009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阻断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维系其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美元地位的稳固,缓冲贸易逆差调整后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经济体依赖下降的冲击。

前总统特朗普上任之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中贸易逆差的调整即成为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的最大理由。特朗普政府实行的与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可被视为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再次尝试。

四、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具体目标

(一)美国官方公布的调整目标

在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基础之上,可以大致确定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目标。为实施前总统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2010年以来,美国极力推动全球性失衡的调整。美国前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认为,^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实现,需要减少对美国消费的依赖,建立一套“规范”的汇率政策。他们认为,主要经常项目顺差国需要作出努力,美国提供了一个使“中国未来几年经常项目赤字约占GDP 4%的水平”的计划。实际情况是在21世纪初,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3%,直到2011年才开始回落至3%以下,2013年尚有2%,2016年达到2.8%,离美国的目标相差甚远。

在2010年10月G20财长会议上,美国提出了经常项目失衡的双向调整要求,即提出了所有成员国在2015年前将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控制在4%以内的方案。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自2009年开始,其经常项目赤

字占GDP的比重已在4%以下,2010年后下降到了3%以下。2013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规模仅为2006年峰值的二分之一。若今后经济增长率继续超过贸易逆差的增长率,则美国将继续保持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下。假定2020年左右美国保持其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的水平,按美国平均2%的GDP增长速度来估算,则2020年经常项目赤字大约维持在6000亿—7000亿美元,即为当时美国官方预计的调整目标值。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向世界各国表明态度,贸易逆差的调整范围已经达到了美国所设定的目标区,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已经不在美国。

(二)“出口倍增计划”下的目标区间

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明确了出口增长目标,却未明确进口增长目标。以2009年为标准,5年内出口倍增,意味着每年出口增长率要达到15%方能达到倍增值3.14万亿美元的水平;若进口同步增长,则2015年进口总值大约在3.91万亿美元的水平,此时贸易逆差7700亿元左右,与2006年的水平持平,显然未达成政府所愿。考虑到两个进口年增长率水平为13%和14%来估算相对应的美国进口总额大致在3.58万亿美元和3.74万亿美元,此时贸易逆差为440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从绝对值来看,6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2004年的水平,4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2002年和2009—2010年的水平。考虑到经济规模整体扩大与经济增长惯性这一因素,2015年美国政府的控制目标区应该是在5000亿—5500亿美元之间,取高值就是5500亿—6000亿美元。就实际情况来看,2016年美国贸易赤字502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7%,较上年度低0.1个百分点,尚在目标区范围之内。2017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5660亿美元,系2008年以来的最高值,占GDP比重的2.9%,接近目标值上缘3%的警戒线。到2020年,若美国将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控制在2%以内,则贸易

赤字大致在 4 500 亿—5 500 亿美元之间。

(三)特朗普政府的调控目标

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贸易逆差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明确表示要削减贸易逆差,认为这是摧毁美国就业岗位和制造业的主要因素。以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理由来看,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被迫向中国转移技术,同时中国产品享受到了政府的补贴。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减少中美贸易差额。虽然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并未提供明确的区间,但是有明确目标国家。

2017 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 8 100 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有 2 440 亿美元,整体贸易赤字同比增长 12%,达到 5 660 亿美元。2018 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上升到 8 91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服务贸易顺差 2 702 亿美元,据此,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达到 6 211 亿美元,是 2008 年以来最大值,较 2017 年贸易逆差总额增长 12.5%。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15 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 3 362 亿美元,2017 年高达 3 752 亿美元。2017 年 3 月,特朗普政府明确要求中国缩减贸易逆差 1 000 亿美元,5 月美国贸易代表团提出中国要在 2020 年 7 月前削减贸易逆差 2 000 亿美元的方案。2019 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较上年度稍为收窄至 6 168 亿美元,没有达到特朗普政府设想的调整目标。若不考虑中国贸易差额减少后其他国家的替代效应,到 2020 年底,美国贸易逆差将较 2017 年削减 2 000 亿美元左右,约 4 000 亿美元的水平。

五、以目标为导向的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成效

美国贸易逆差既是美国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导致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最重要的一方面原因。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不断地追求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美国贸易逆差

调整的目标又关系到美国自身所要承受的成本以及相关国家所要承受的成本。因此,不仅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实现并非轻而易举,而且美国自身及相关国家也将承受一定的成本压力。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提出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以量化宽松为重点的货币政策,以出口倍增为目标的贸易政策,以限制金融体系盲目创新为诉求的监管政策,几大政策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彼此支撑,锁定美国经济深层结构的根本症结,不仅在短期刺激美国经济,更是为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维系美国经济长期平衡。

在现有经济格局下,通过增加服务出口来增大服务贸易顺差是最好的选择但并不符合长期利益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要重振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先进制造业凭借其乘数效应最大,能够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的优势愈加明显,在美国强力推动的“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连续增加,制造业企业利润占美国境内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美国制造出口市场也逐渐回暖,其制造业产品出口在 2009 年后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从 2008 年的 8 000 亿美元增长至 2014 年的 11 600 亿美元。

再工业化战略促进若干新兴产业取得了积极进展,推动美国经济可持续化发展,尤为显著的是在能源行业,页岩油气勘探开采技术的突破使美国在能源生产与能源自给方面获得引人注目的进展,2011 年美国能源出口量自 1949 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美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2015—2017 年,美国保持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地位,其石油出口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 7%左右,美国在能源领域拥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先发优势。过去,石油进口一直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现在已大大减少,2008 年美国原油贸易赤字高达 3 914 亿美元,约占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 47%,到 2015 年,分别降至 879 亿美元和 11.5%,能源对外

贸易逆差的大幅下降有效地促进美国经常项目平衡。受此影响,美国的贸易逆差有逐步减少的趋势,2010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降至4 978亿美元,恢复至2003年的水平,较2006年的最高值减少了2 614亿美元,至2013年整体贸易逆差下降至4 763.93亿美元。得益于页岩油气大规模开发,2018年8月美国超越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丰富的页岩油气储备巩固了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美国正在积极谋求对全球能源格局的主导权。

金融危机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在推动技术创新领域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不断研发的作用下,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展现出极强的全球竞争力,以特斯拉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引领世界高新技术产业新的发展趋势,成功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并实施“出口倍增计划”和制造业回归政策以来,美国就业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失业率逐渐下降,出口促进就业的效果显著。2009—2014年,美国的出口带动了约200万就业岗位;2014—2015年,制造业回归所产生的工作岗位与之前制造业离岸生产所带走的工作岗位基本达到平衡;2016年净增加约2.5万个工作岗位,开始实现反超,2015—2016年制造业回归速度出现加快态势。出口部门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对外出口从2008年的18 426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底的21 945亿美元,虽然美国出口商品贸易仍表现为逆差,但是商品贸易逆差幅度不断缩小,出口倍增计划在短期内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出口,使得贸易逆差得到缓解,受此影响,美国各项经济指标在此期间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对经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重建国际贸易新秩序,2013年6月美国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并于2016年2月4日正式签署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明美国全面

介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以及试图主导亚太经济的意图。前总统奥巴马曾明确提出不能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TPP的本质就是要重建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力图打造一个美国标准的亚太地区投资体系,排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对美元霸权造成的潜在威胁。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时,认为中国在亚太战略中夺取了美国人的利益,企图将美国排除在外以重塑亚太经济秩序,因此在上台之初便宣布美国退出TPP,通过双边谈判与主要贸易伙伴缔结新的贸易与投资协定,2017年11月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构建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多层次战略联盟,强化多边合作并深化双边互动。美国商务部通过“进入亚洲”“发现全球市场”“贸易风向”三大贸易对接活动,深化美国与印太地区的贸易往来,2018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7 200亿美元,环比增长4.5%。

美国政府推动《美墨加协定》(USMCA)的谈判与签署,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北美经济板块经贸规则的重新整合,该协议与美国的政治经济诉求一脉相承。USMCA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门槛,为国际经贸规则设定提供了新标杆,以此为起点,美国顺利调整了与韩国、日本和欧盟的贸易规则。2018年9月美韩签署自贸修正协议,扩大美国对韩国的出口,并保护美国汽车产业就业岗位。2019年10月,美日签署贸易协定,协议规定美国出口日本的90%农产品将免税或享受关税优待,美国仍不断强调美日贸易不平衡,敦促日本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欧盟在华盛顿联合声明中不得不写入消除汽车工业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加上中国与美国也非盟友关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贸易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以美中巨额商品贸易逆差为由,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行为挑起中美贸易战。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经济迅速发展,美中贸易失衡逐渐成为常态。2010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4 年中国名义 GDP 总量占美国名义 GDP 总量的 60.12%(如表 2 所示),此后中国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中美间基于互补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向竞争关系转变,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事。

表 2 1960—2019 年中国名义 GDP 与美国名义 GDP 变化趋势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 GDP	美国 GDP	中/美比重	年份	中国 GDP	美国 GDP	中/美比重
1960	557	5 264	10.58	2009	51 020	144 187	35.38
1970	919	10 383	8.85	2010	60 878	149 643	40.68
1980	3 051	27 881	10.94	2011	75 546	155 179	48.68
1990	3 903	58 005	6.73	2012	85 320	161 552	52.81
2000	12 113	102 847	11.78	2013	95 744	166 915	57.36
2002	14 706	109 775	13.4	2014	104 767	174 276	60.12
2004	19 553	122 749	15.93	2015	110 599	181 207	61.03
2005	22 866	130 937	17.46	2016	112 370	185 619	60.54
2006	27 526	138 558	19.87	2017	123 232	193 868	63.56
2007	35 519	144 776	24.53	2018	138 919	204 941	67.78
2008	45 966	147 185	31.23	2019	143 634	214 316	67.02

资料来源: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汇率为当年名义汇率。

2018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实施了各种特别关税,基本实现了对华进口商品的全覆盖,中国也相应采取各种反制措施进行应对。现有的实证研究指出,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即未能纠正美国的贸易失衡、提高美国蓝领工人阶层就业率、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并没有明显改善,提高关税的成本基本将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的福利。自 2018 年 7 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对华出口与其总体出口增速的差额最高达到 37%,美国出口至中国商品的增速一度下滑至-32.7%,下滑幅度超过次贷危机时期对华出口同比的-25.1%,创 1999 年以来新低。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 年和 2017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 3 470 亿美元和 3 752.3 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 69%和 66%,2018 年美中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达到 4 192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2019 年美中贸易逆差降至 3 456 亿美元。经过漫长又曲折的谈判后,中美双方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实现中美贸易战的“暂时停火”。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逐步动摇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连续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美元促成美元指数整体贬值,提高了美国产品出口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也致使全球流动性泛滥,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信用,弱化了美元霸权的资本信用基础。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与美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并存的关键,为继续维持美元强势地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来重振美国制造业,力图夯实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强化印太再平衡战略,提升美国军事霸权;通过减税政策推动跨国公司资本、收入回流;以各种理由延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试图再次掌握全球经济秩序话语权;提升对石油定价的影响力,强化各国对美元的依赖。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恰逢美国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进入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为控制美国经济过热,美联储开始持续加息。因此,美国的税改、缩表、加息三项政策的效果重叠,

预计在未来两到三年有可能打破国际资本流动的均衡性,产生洼地效应,促使资本回流美国国内,外国资本也会流入美国,从而致使美元更加稀缺,形成长周期的美元强势。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美国贸易逆差仍将长期持续。综合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得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幅度缩小,美国出口向好,目标逐步趋近,巨额贸易逆差也未削弱美国的头号贸易强国地位。

六、COVID-19 疫情影响美国贸易逆差调整

COVID-19 疫情全球蔓延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断崖式冲击。由于美国政府在疫情暴发早期未予以足够重视,致使疫情加速蔓延。为控制疫情进一步恶化,多地“封城断航”,多产业停工停产,国内外经济联系均被切断,美股短期内四次熔断。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0 年第二季度美国 GDP 萎缩 31.4%,^⑥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在 2020 年 4 月跃至 14.7%,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最高值,虽然在 5 月份有小幅下降,但仍高达 13.3%。^⑦美国对外贸易受疫情和为抵抗疫情的限制政策影响较为严重,2020 年 8 月的美国贸易逆差升至 671 亿美元,较上个月扩大 5.9%,^⑧这是自 2006 年以来最大单月贸易逆差,其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 7 月下降了 19 亿美元,达到 264 亿美元。

COVID-19 疫情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贸易的不对称冲击重新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水平,使 2018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改善贸易逆差的努力失效。贸易逆差扩大的背后,是此前被 COVID-19 疫情压抑的需求正在反弹,伴随美国各州逐步放开对商业活动的限制,美国大量进口海外的汽车、工业材料、机械设备等资本品以及手机、家具等消费品。与此同时,美国的出口暂未能同步恢复,在后疫情时代,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提振美国对外贸易显得愈发重要。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承诺在

2020 年初到 2021 年底从美国增购 2 000 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其中产品 1 621 亿美元。但 2020 年全球 COVID-19 疫情冲击,生产与消费受到重大影响,2020 年 1 月至 8 月,美国贸易逆差已高达 4 21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5.7%,^⑨若考虑 GDP 总量下滑的事实,其占 GDP 的比较上年度增长更大。

为应对 COVID-19 疫情的冲击,美国政府迅速推出史无前例的救市计划,短期内这些救助措施能降低 COVID-19 疫情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有效地稳定金融市场,2020 年第三季度 GDP 年增长率为 33.1%,股市也迅速回暖。中长期来看,美国对 COVID-19 疫情的应对举措或将恶化美国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降低经济增长潜力,加剧美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弱化美元霸权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贸易复苏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美国优先”的理念,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消耗其信用资源,减弱美国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受 COVID-19 疫情冲击,拜登政府虽然可能继续实施较为强硬的贸易政策,但将加强与盟国的协商合作,来制定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整体上,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将让位于经济增长目标。

七、结语

美国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长期课题,贸易逆差调整也是一个长期课题。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并非要消除其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之上将逆差占 GDP 的比重控制在一个波动区间之内。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成本及目标的实现,需要其变革经济增长方式,修正福利制度,在维持一定的经常项目赤字的基础上稳定美元霸权地位,需要在扩大国内债务同时保持国际收支的整体稳定。面对 COVID-19 疫情的冲击,美国短期内对贸易逆差的调整将让位于经济复苏与增长目标。对众多出口型国家、贸易顺差国家来说,需要继续应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及美国强硬贸

易政策对自身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将扩大内需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对以东亚为代表的多数国家来说,需要面对如何调整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注释]

- ① 拜登计划推翻“美国优先”胜算几何? [EB/OL]. https://www.sohu.com/a/426679377_119038.
- ② Barack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n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16.
- ③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Inaugural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17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4/18/presidential-executive-order-buy-american-and-hire-american>.
- ④ 参见:《谁在美国的“实体清单”当中——中美经贸系列报告(一)》, 国金证券研究所, 2020-5-27, https://www.sohu.com/a/398450872_120014261.
- ⑤ 参见:彭博社. 盖特纳力挺经常项目目标 G20 意见不一 [EB/OL]. 腾讯财经, 2010-10-22, <http://finance.qq.com/a/20101022/007424.htm>.
- ⑥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http://www.commerce.gov/>.
- ⑦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http://www.bls.gov/>.
- ⑧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http://www.bea.gov/>.
- 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036913710016814&wfr=spider&for=pc>.

[参考文献]

- [1] Dooley M P, Folkerts-Landau D, Peter G M. An Essay of Revived Breton Woods System[R].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 [2] Dooley M P, Folkerts-Landau D, Peter G M.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Effects of Periphery Interven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o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Center Countrie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04.
- [3] 宋玉华, 陈吉吉.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11): 60-65.
- [4] 刘伟. 从经济实力与国际货币体系看美国贸易逆差——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91-96, 160.
- [5] 袁冬梅, 刘建江. 美国制造业重振中的资本回流困境与对策[J]. 学海, 2012(1): 33-39.

- [6] 李晓. 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权力——中美贸易争端的货币金融背景及其思考[J]. 国际经济评论, 2018(6): 52-71, 5-6.
- [7] 李巍. 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元货币霸权[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5): 99-100.
- [8] 毕吉耀. 如何看待和应对全球经济失衡[J]. 宏观经济研究, 2006(9): 58-63.
- [9] 顾国达, 郭爱美, 牟群月. 论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基于耦合机制视角的分析[J]. 探索, 2013(2): 74-79.
- [10] Bernanke B S.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 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R]. At the Sandridge Lecture, Virginia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 Richmond, Virginia, 2005.
- [11] Gourinchas P O, Rey 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djust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9, 115(4): 665-703.
- [12] 韩召颖, 孙志强. 美国对外资产负债间收益率差对美国外部失衡调整的影响研究述评[J]. 金融发展研究, 2017(11): 3-8.
- [13] 曾绍龙, 曾凯霖. 特朗普经济政策评述及其效应[J]. 亚太经济, 2018(1): 12-20.
- [14] Krugman P.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J]. Nber Working Papers, 1995, 50(1): 51-71.
- [15] 张丽娟, 郭若楠. 美国贸易逆差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研究[J]. 美国研究, 2019(3): 9-25, 5.
- [16] 詹姆斯·杰克逊.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美国贸易逆差[J]. 王宇, 译. 金融发展研究, 2018(9): 54-57.
- [17] 胡冬梅. 持续贸易顺差背景下的中国货币政策选择[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55-117.
- [18] 于春海. 贸易赤字、债务可持续性与美国的贸易政策行为[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4): 108-128.
- [19] Goldstein M, Lardy N R. China’s Role i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R].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 [20] 沈国兵.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分析[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20(4): 10-24.
- [21] Mussa M. The Euro and the Dollar 6 Years after Creation[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5, 27(4): 445-454.
- [22] 姚枝仲, 齐俊妍. 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专辑——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及变化趋势[J]. 世界经济, 2006(3): 42-47.

- [23] Cline W R.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btor Nation: Risks and Policy Reform[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2005.
- [24] O'Neil, Hatzious. U. S. Balance of Payments[J]. Global Economics Papers, 2004, 104(3): 69-87.
- [25] 李晓, 周学智. 美国净对外负债前景与美元汇率调整[J]. 国际金融研究, 2014(2): 29-42.
- [26] 党印.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研究的新进展[J]. 当代经济管理, 2008(12): 7-23.
- [27] 陈奉先, 涂万春.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基于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特殊融资安排视角[J]. 国际金融研究, 2006(8): 41-49.
- [28] Nouriel Roubini. The Almighty Renminbi? [N]. New York Times, 2009-5-14.
- [29] 易宪容. 美国量宽政策退出的市场不确定性效应[J]. 财贸经济, 2014(5): 39-50.
- [30] Edwards. Is the U. 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ustainable? If Not, How Costly Is Adjustment Likely to Be? [C].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5(1): 211-271.
- [31] Bernanke Ben. Global Imbal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R]. In Bundesbank Lecture, Berlin, Germany, 2007.
- [32] Corden W M.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Paradox of Thrift[R].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2.
- [33] 李石凯. 新世纪的美国贸易逆差、财政赤字与税收政策[J]. 社会科学, 2008(2): 23-30.
- [34] 刘建江. 美国贸易逆差[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251-291.
- [35] Salvatore, Dominick. Twin Deficits, Growth and Stability of the US Economy: Editor's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6, 28(6): 603-604.
- [36] Linda Yueh. Understanding Global Imbalances[A]// Selected Papers of Beijing Forum 2009[C].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 77(5): 31-36.
- [37] Eichengreen B J.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Lessons of Bretton Woods[J]. Economie Internationale, 2004, 4(100): 39-50.
- [38] 李扬, 余维彬. 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面临的挑战[J]. 国际金融研究, 2006(2): 12-18.
- [39] Eichengreen B J, Razo-Garcia R. How Reliable are De Facto Exchange Rate Regime Classifica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3, 18(3): 216-239.
- [40] Obstfeld M, Rogoff K.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5(1): 67-123.
- [41] 刘艳靖, 张云. 贸易失衡的根源: 汇率还是经济结构——基于美国案例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5): 50-56, 88.
- [42] 卢凌宇, 鲍家政. 从制造者到索取者: 霸权衰落的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9): 74-106, 157-158.
- [43] Blackwill R D, Tellis A.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M]. New York: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2015: 83-105.
- [44] 刘建江, 胡悦, 李喜梅.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特征及影响研究[J]. 商学研究, 2020(1): 5-25.
- [45] 沈雅梅.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J]. 国际问题研究, 2018(2): 96-111.
- [46] 殷敏. 《美加墨协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启示与应对[J]. 环球法律评论, 2019(5): 160-174.
- [47] 王鹏远, 朱颖妮. 美国推动《美墨加协定》的考量、特征及其对中国带来的挑战[J]. 价格月刊, 2020(8): 79-84.
- [48] 刘建江. 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三维成因[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82-90.
- [49] 袁冬梅, 刘建江. 论巨额贸易逆差与美国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J]. 国际问题研究, 2007(7): 55-60, 67.
- [50] 李喜梅, 王健康, 刘建江, 等.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演进逻辑及中国应对策略[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13-122.